

 **辉煌历程**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点书系



中国人口政策60年

邀约大家 纵论中国

国庆60周年献礼

创社科经典 出传世文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辉煌历程 ·

中国人口政策 60 年

田雪原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口政策 60 年 / 田雪原著.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097-1013-5

I. 中… II. 田… III. 人口政策 - 中国 IV. C9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8579 号

· 辉煌历程 ·

中国人口政策 60 年

著 者 / 田雪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财经与管理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26

电子信箱 / caijingbu@ssap.cn

项目经理 / 周 丽

责任编辑 / 王玉水

责任校对 / 赵士孝

责任印制 / 蔡 静 董 然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7.25 字数 / 401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013-5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田雪原传略

田雪原，1964年8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64.8—1979.4在教育部等国家机关工作，1979.4—1982.5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人口经济研究，1982.5—1983.6在美国东西方中心做高级访问学者，1984.4—1998.12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中心）所长（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主要



社会兼职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全国社科规划人口学科组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1998—2007），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国际人口科学联盟（IUSSP）成员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表《新时期人口论》、《大国之难——当代中国人口问题》、《人口学》等专著28部（含主编），《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翻案》、《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论文500余篇（含30多篇英、俄、日文），研究报告30余篇，本人独自撰写在500万字以上，论文代表作收集在《田雪原文集》一、二、三、四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持国家重大、重点项目6项，与联合国人口基金、美国、日本合作项目5项，在人口理论拨乱反正、人口发展战略、中观人口控制与社区综合发展、家庭经济与生育、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发表了有独到见解和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和美、日、荷、

中国人口政策 60 年

比、澳等国作学术报告多次，受到普遍好评和重视。1984 年被授予首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88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1991 年被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IBC）授予“国际知识分子名人”证书并在《成功的人》中作了业绩介绍，1995 年被美国传记协会（ABI）载入《世界五千名人录》，1996 获中华人口奖（人口最高奖），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00 年获国家图书奖，2003 年获“第六届中国民族图书奖”一等奖。科研成果中，还有 10 多项获部委级特别荣誉奖、一等奖。

The Biography of Tian Xueyuan

Tian Xueyuan graduated from Economy Department of Peiking University in August, 1964. He worked i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ome other state organs during August, 1964 and April, 1979, worked on population and economy researches in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uring April, 1979 and May, 1982, worked as a top visiting scholar in American East West Center during May, 1982 and June, 1983, and was the dean of the Population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uring April, 1984 and December, 1998. He now is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Consultation Committee, researcher, tutor of doctors, country's expert with exceptional contributions. His major social part-time jobs are: a member of Study Group of State Department's Degree Committee, the vice president of PSC and Society of Social Economy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 of China, an expert member of State's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a member of IUSSP, and so on.

Since 1970s, there are 28 books he (and as the chief editor) wrote, such as *On Population of the New Period, Calamity of the Big Country—Population Problems of China Today*, and *Demography*, more than 500 papers (including more than 30 pieces of English, Russian and Japanese papers), such as *Exonerate For Ma Yinchu's New Theory on Population*,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National's Economy*, and more than 30 research reports have been published. More than 5 millions words are written by himself.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are all in *Tian Xueyuan's Corpus* 1, 2, 3, and 4. He has taken charged of 6 significant national projects, cooperated with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America and Japan on 5 projects since 1980s. He

created original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findings in many areas, such as, rectifying on population theor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population control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family economy and childbirth, aging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and popul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e has given reports in China and in America, Japan, Holland, Belgium and Australia many times, and received universal praise and recognition. He was awarded “Young Expert with Significant National Contributions” in 1984, the first prize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ancement Findings” in 1988,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Celebrity” by IBC in 1991, and his achievements were introduced in “Successful People”. He was taken in “World 5000 Celebrity” by ABI in 1995, and his story was introduced in it. In addition, he was awarded “Chinese Population Prize”, which is the highest level of population prize, and “Five Top” Project Prize of cultural and ethical progress in 1996, “National Book Prize” in 2000, the first prize of “6th Session Chinese National Book Prize” in 2003. There are more than 10 of his scientific research findings were honored with ministries and commissions’ special prize and the first prize.

前 言

面前放着五本论著：彭珮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张维庆主编《新人口礼赞——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回顾与展望》，杨魁孚等主编《中国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易富贤著《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以及美国人 J. 艾尔德（John Aird）的《屠杀无辜》。这五本论著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做出阐释，却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总体上说，前三本持肯定的态度，后两本持否定的态度，只是肯定或否定的方面、重点、程度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其实，一些人由于所站立场不同，对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持有不同的观点本属正常。他们或者对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基本不知或知之甚少，看到或听到某些违法违纪现象的报道，或听信反对派理论“权威”的宣传，感到不理解、不赞同甚至得出主要靠强迫命令推行的结论。但是，他们一旦了解了事情真相或看到实事求是的理论阐发之后，便很容易转变他们的观点，甚至成为这一政策的宣传员。举个例子，1980年5月，中国人口学家代表团一行五人出席美国东西方中心举办的中国人口分析会。在那次会上，J. 艾尔德便手拿两份地方报纸，提出异议和质问。一是某省某村一农户因拒交计划外生育费被当地干部拿走犁、锄等农用工具的报道。他质问没有了农具农民如何生产？他认为农民没有办法只好变卖家当交费，证明中国推行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是政府强迫命令的结果。二是说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不可靠，认为是政府导演、为了维护国家形象人为编造出来的。关于后一点，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当即指出：中国人口数据基本上是可信的，因为中国有延续几千年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每个家庭都有一本“户口簿（本）”，登记全家人口，包括姓名、性别、年龄、

民族、受教育程度、职业以及与户主的关系等基本内容；此外，在过去二三十年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有按年或按月发放的粮票、布票、肉票、油票、购物券（工业券）等生活必需品票证，每个人都不能遗漏，否则维持吃穿等基本生活资料的供给就会失去保障，这些在客观上起到了人口统计的佐证作用。中国这样的人口统计和管理办法，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是找不到的，中国的人口统计质量至少不比美国差。我们的发言赢得与会者的赞同，也引起人们对美国人口统计准确性的议论，纷纷对他们电话访谈一类调查的可靠性提出疑问。关于前一点，会议中间休息喝咖啡时，一位对中国人口问题颇感兴趣的在读博士生问我：J. 艾尔德讲的是不是事实，有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我向她解释三点：第一，中国推行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历来强调把宣传教育放在第一位，讲清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大力控制人口增长的道理。第二，中国是一个拥有 960 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将近 10 亿人口（1980 年大陆人口 9.87 亿人）的国家，且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因此发生点儿这样那样的事情不足为怪。J. 艾尔德列举的事情可能是有的，还可能再找出第二个、第三个，但是再多能占到全国 1.7 亿农户多大比例？恐怕连万分之一也占不到吧！为什么要用个别代替一般呢？这种以点代面的做法是不严肃的，也是不科学的。第三，即使是个别现象，中国政府和从事人口计生工作的干部也十分重视，强调各级政府要下大力气纠正。这位博士生听了我的话后，觉得很有道理，就找到 J. 艾尔德辩论，弄得 J. 艾尔德无言以对。从此她对中国的口政策有了自己的理解，后来她到中国学习考察一年有余，用她亲身的感受讲述中国的人口政策，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可谓由不知论者转变为知之论者的典型一例。

基于这样的认识，实事求是地阐发中国人口政策提出和制定的社会背景、理论依据、主导思想、基本要求和实施的效果，开展不同观点的讨论和争论很有必要。因为讨论和争论，对推动真理探讨和学术进步是有益的，真理总是越辩越明嘛！可悲的是，以往包括人口学在内的许多社会科学问题的讨论、争论和争鸣，对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很不够，相反动辄扣

“帽子”、打“棍子”，以至于学术进步需要的学派难以形成，个人之间的偏见和成见却不少。为了扭转这种不利于学术发展的局面，老一辈经济学家孙冶方与于光远先生之间，曾经相约进行过关于价值论窄派与宽派彼此指名道姓的争论，用自己的行动带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实施；然而不幸的是，争论刚刚进行一个回合，孙冶方先生便与世长辞了。笔者以为，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而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会妨碍学术的自由讨论、发展和繁荣。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笔者主张，讨论和争论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为了探讨真理、推动学术进步，重点不在谁对谁错，更不在谁“左”谁“右”之争；二要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所言应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之上，不赞成在既不了解情况又不占有充足资料的情况下，就凭“想当然”大发议论；三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对方之长补己之短。这“三要”似乎是题外的话，但是在以往的关于中国人口政策的讨论中，确实存在着既不了解情况又没有充足资料而大发议论的情况，以致形成某些问题上的以讹传讹。这种不知而无畏的精神不可长，因为它违背了科学就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容易误导和走进误区。

众所周知，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政府便提出了节制生育的主张；50 年代后期有一场关于人口问题的大辩论；60 年代前期主要在城市开展了不同程度的计划生育；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计划生育工作受到无政府主义冲击而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到 70 年代全国人口突破 8 亿人以后，计划生育工作才有较大的起色。中国的人口政策在起伏跌宕中艰难起步和向前推进。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包括人口科学在内的科学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以为马寅初先生新人口理论翻案为契机，人口理论揭开发乱反正新的篇章，人口研究空前活跃起来。不仅一批研究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工作者转入人口研究领域，有见地的一些自然科学工作者也捷足先登加入进来，对人口变动和发展趋势做出多种方案的预测。中央对当时人口研究提出的问题和未来人口变动发展趋势研究很重视，1980 年

3—5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人口座谈会，连续开了五次，定下中国人口发展的战略、方针和政策，这是理解和研究中国人口政策的关键和枢纽。本人作为该座谈会参与者和会议报告起草者，经历了座谈会全过程，尤其对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会不会引起智商下降、年龄结构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四二一”家庭结构等敏感问题，在会议报告及其附件中做了专门的阐发。然而笔者对这些，28 年来却始终守口如瓶，恪守“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准则。其间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不断发表一些内部或公开的论著，说当年没有考虑人口老龄化严重影响者有之，说没有考虑长远劳动力供给短缺者有之，说没有考虑独生子女家庭“四二一”结构者也有之，把当时的人口决策说成过于草率，甚至是“拍脑袋”的结果。如果真的是没有考虑，那么“过于草率”的指责就是合理的、应该的。问题在于当时不是“没有考虑”，而是考虑得比提出的问题还要多，可以说，今天提出的各种问题当时几乎都有所涉及，因而用“过于草率”、“拍脑袋”概括是不符合实际的。如今，一是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效果已经显现，人口素质和结构方面的各种问题相继浮出水面，许多问题牵涉到当年的决策，需要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是时间已经过去将近三十年，当年讨论的问题已无秘密可言，而且，越是弄清楚当年讨论的情况和为什么做出那样的决策选择，越是有利于对人口政策的全面了解，更好地把握未来人口变动和发展的趋势。三是参加当年座谈会的学者本来就不多，如今几位老先生已相继离我们而去，而参与核心工作的学者更少，有时少到只有一两个人。本人作为参与核心工作的学者之一，有责任也有义务将当时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公之于众，提供给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研究参考。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的是在 60 年一个甲子循环中，前 30 年与后 30 年可能呈现截然不同的情况。笔者以为，一部中国现代史可用三个 30 年概括：第一个 30 年，从 1919 年发生在北京（当时称北平）的“五四运动”起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止。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中国人民用 30 年时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第二个30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止。这一时期，经济上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艰难地推进工业化；政治上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不断革命论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第三个30年，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这一时期经济上摆脱计划经济束缚，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强调民主法制建设、开辟构建和谐社会发展新阶段。以第二个30年和第三个30年比较，前者强调的是计划经济、阶级斗争，后者强调的是市场经济、和谐社会，“河东”与“河西”泾渭分明。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从“河东”到“河西”转变的背景、原因、过程和效果，注意转变过程中中间环节的不可替代性。举个例子：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界有的同志率先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应当说，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后来发展到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然是更具长远意义的突破。我们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就不能用后来确定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要求前期的改革一步到位、早就应该提出建立市场经济，需知那时提出商品经济和“两种调节”是何等艰难、需要何等的理论勇气！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评价改革开放的历史。对以往人口政策的评论也应如此，要用历史的眼光、发展的眼光，而不能运用“倒过来”的眼光和方法论。

笔者作为曾经参与人口战略和人口政策工作，现今仍关心、研究当前和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政策走向的一名学人，平心而论，还没有发现二三十年前哪一项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有过如此开放式的民主讨论。如能将讨论的情况和做出选择的原委再现出来，对于澄清事实、促进人口政策研究的深入，总可以起到正本清源、弄清政策来龙去脉的作用。笔者这样说，并不等于当年一切问题都讨论得尽善尽美、解决得天衣无缝。不是的。人口同世间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再好的人口政策、再准确的人口预测，也要在实践中验证和不断修正完善。对以往人口

政策的阐发，笔者遵循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反映当年讨论和决策之原貌，重点在如何决策、怎样决策研究上，一般情况下尽量不涉及个人。对当前和未来人口政策的阐发，主要来自本人研究和本人主持的研究课题取得的成果，不代表任何组织和其他任何人，属纯学术性质的研究和探讨。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在三十多年从事人口科学研究过程中，笔者分出很大一部分精力研究人口发展战略和人口政策，感触颇深。古稀之年，一个愿望在心中萦绕多年，就是要把亲身经历过的中国人口政策的提出、形成和发展的情况整理出来，并且纳入人口科学研究视野，将其奉献给 13 亿中国人民以及国际社会关心中国人口变动和发展的各界人士。十年前笔者所著《大国之难——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人口与经济关系中总人口与消费、劳动年龄人口与就业、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人口素质与科技进步、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人口地区分布与生产力布局的矛盾和问题，以及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人口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初步提出和阐发了解决人口问题的一些思路。本书可视为它的姊妹篇，给出以往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轨迹、当前政策的具体分析和未来面临的政策选择。对于上述内容，笔者均站在学术视角做出分析和探讨。不言而喻，这样的分析和探讨是否科学，能否经得住历史的检验，随着时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流转，答案也就自然地流淌出来。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创辉煌

——《辉煌历程——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点书系》总序

柳 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60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奋勇向前、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60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60年，是举国上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创社会主义大业的60年。60年峥嵘岁月，60年沧桑巨变。当我们回顾60年奋斗业绩时，感到格外自豪：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正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系统回顾和记录60年的辉煌历史，总结和升华60年的宝贵经验，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刻领会和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领导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民族自豪感，大力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

信心，在新的历史起点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深入推动科学发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苦难深重和任人宰割的境地。此时的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富裕；需要解决两大矛盾：一个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个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我们民族面对的历史任务，决定了近代中国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也才能开启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之路。历史告诉我们，一方面，旧式的农民战争，封建统治阶级的“自强”“求富”，不触动封建根基的维新变法，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亡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都不能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因此，

中国必须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党全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最终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国家采取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军事包围等手段打压中国，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紧紧抓住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中心环节，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从1953年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和转变，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对中国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了明确的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

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

但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艰辛的过程。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代表着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有这种认识，所以这种探索贯穿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开始了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道路”的历史性探索。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力图在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反映了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之后求强求富的强烈渴望。探索者的道路从来不是平坦的。到了 50 年代后期，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左”的偏差。特别是 60 年代中期，由于对国际和国内形势判断严重失误，“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造成了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创伤，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十分困难。1976 年我们党依靠自身的力量，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内乱，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社会主义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冲破个人崇拜和“两个